

吴老与植物考据研究

王锦秀

(1975~)，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副研究员。

我认识吴老，始于他一直从事的另一门学问——植物考据研究。2002年我入植物所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即为植物考据。研究初期，我对植物考据的研究思路有许多困惑，幸遇吴老指点，涣然冰释。吴老是一位高明的指点者，他教我他几十年来从事植物考据研究的经验，特别是“由近及远，先实后虚”几个字，对我的研究有莫大的帮助。

2005年我博士毕业后，将博士论文呈吴老审阅。吴老做了详细的批注，给予肯定，并将意见发给我和汤彦承老师。随后，吴老邀我赴昆明随他工作。能当面向吴老请益，是件很幸运的事情。我在吴老指导下考证了“胡麻”原植物以及《神农本草经》的真伪等问题。期间，我见识了吴老的“博闻强记”，感受了吴老研究思路之开阔、采用证据之严谨。当然，也意识到自己知识储备还存在许多不足。吴老还将他新近研究《植物名实图考》及其早年开展《新华本草纲要》等一批植物考据研究的手稿复制送我，嘱我将来完成对《植物名实图考》中植物的考证，并希望能在合适的时机整理出版。这对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回京后，我与汤彦承老师一起展开工作。我们先是完成了《植物名实图考》中的云南植物研究，后又着手《救荒本草》中400多种植物的考证。期间，我们还尝试利用古籍文献证据来探讨地区环境变迁和物种多样性的变化。随着2007年初《中华大典·生物学典》的启动，我开始有更多机会向吴老学习，特别是他系统整理中国植物学古籍文献的整体工作思路和布局，令我印象深刻。期间吴老委我以新任务，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任务迄今未能完成，想来很是遗憾。

2009年5月众弟子拜望吴老（前排右起：王锦秀、吴征镒、段金玉、高天刚、杨云珊；后排右起：高信芬、杨亲二、李建强、周浙昆、夏念和、孙航、李志敏、李学东）



吴老从事植物考据研究，有一宏愿，即系统整理中国植物学古籍文献，考证其中植物，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植物文化。在植物考据研究上，吴老既是拓荒者，又是集大成者。我想有必要将他在这方面的工作介绍给植物学同行，也希望能有更多学者对这门学问产生兴趣。

何谓植物考据研究？

中国古代涉及植物的文献可谓浩如烟海。由于物种多（中国拥有约3万种高等植物），我们的先民在利用这些植物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形成了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内容最丰富的传统植物文化，并记录在我国从甲骨文开始约3500年来的历史文献中。但由于历史变迁、地域的不同，各族群利用植物方式的差异等等原因，汉代以前，中国植物同物异名、同名异物现象已比比皆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古代植物考据研究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尔雅》“释草”“释木”即是其中的代表。

西学东渐后，植物分类学成为现代植物考据的基础。植物中文名需要对应学名。然而，这一工作初始是由外国人来做的，如欧洲和日本学者。他们的考证结果有不少错误，这影响了中国植物分类学家对植物中文名称的选择（虽然植物中文名只是local name）及中药原植物的准确鉴定。具体体现在最早的《植物学大词典》和最近的《中国植物志》等一些重要植物学工具书中。如何利用现代植物分类学研究中国古籍中的植物，则是中国现代植物考据研究的新任务。

现代植物考据研究是以植物分类学为基础，解决植物实体和中国古代文献中记录的植物“古今对应、中外衔接”问题的一门学问。这门学问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历史文献中所载的与植物相关的内容，包括植物中文名称的演变、分类、经济利用（衣食住行）、保护等多个方面。目标是要以科学的方法来发掘、整理、保护和利用中国传统植物文化，以此来探讨生物多样性变迁、作物的起源、驯化历史以及中药原植物等等问题。过去这门学问没有固定的名称，曾被冠以“本草学”“本草考证”“古汉名考证”和“古名今证”等等，不一而足。吴老批阅我的博士论文后，倾向于利用“植物考据学”作为此类研究的正式名称。吴老在通信中说：“我很同意‘植物考据学’的提法，并认为比‘本草学’好。它看似范围广了，却更专业化了；服务范围可以是广义的农、林、牧、副、渔，还有医药卫生、环境科学和园林及旅游业。”

现代植物考据研究需要有植物分类学基础，有时还要综合利用文献学、历史学、文字学、训诂学和音韵学等多学科证据。现在愿意从事这一研究的植物学者寥寥无几。

吴老与《植物名实图考》

吴老特别重视《植物名实图考》这部古籍。他认为全面理清中国传统植物文化，应该从《植物名实图考》的研究开始。

《植物名实图考》和《植物名实图考长编》，不失为19世纪中叶，正值鸦片战争迫使我国门户开放之际刊行的奇书。它是中国第一部以“植物”命名的书籍，不同于以往主要记载本草药物的《本草纲目》，也不同于以农用为主的《群芳谱》《广群芳谱》这类农艺专著，它所载植物范围更大、地域更广，就其性质而言，有向更广泛的植物学转变的趋势。胡先骕先生曾谓：“吴其濬之著《植物名实图考》，则着眼已出本草学范畴，而骏入纯粹科学之域，在吾国植物学前期而有此伟著，不能不引以自豪也。”吴老认为，该书是中国植物学史中承前启后的一部巨著。

《植物名实图考》的作者吴其濬，在1840~1846年间，历任湖南、浙江、云南、山西等地巡



抚。作为封疆大吏，他勤于政事，同时也利用“宦迹半天下”的有利条件，所到之处，采集标本、考察生态、咨询民众，考证名实，竭尽公余之全部精力，撰写成这两部巨著。其中《植物名实图考》38卷，记载植物1714种（实际涉及植物超过2000种），插图1865幅，主要是考证植物的名实，兼及实用，“以证诸今”；《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共2卷，收录植物838种，书中摘录了历代本草、农书、方志、诗词杂著书籍中有关植物学的资料，“以稽诸古”。《中国植物志》中的许多科、属、种的中文名称取自该书，据黄胜白和陈重明的研究，科、属中文名分别采用了10和55个；我们初步统计其种级中文名采用了约800个。如果能对该书记载的植物加以科学的考证，将为植物分类学、生物多样性研究、古今植物变迁、植物资源学（尤其是本草学）及中国植物学史研究提供不可多得的基础数据。

吴老幼时偶从父亲书房中得见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1848年出版，1919年商务印书馆新版），于是这部书成为吴老植物分类学研究的启蒙教科书。他在家中对面的“芜园”，“看图识字”认识了许多植物，奠定了他日后从事植物学研究的志趣。1931年，受唐耀先生的鼓励，将其前两年所采标本在班上展出，这批标本约100多种，他都参阅《植物名实图考》和牧野富太郎的《日本植物图鉴》，订了中文名和学名，也因此与《植物名实图考》结下不解之缘。

1939年，吴老与他清华的老师吴韞珍先生一起，考证了《植物名实图考》中的云南植物，尤其是云南的草药和野生花卉。边考证，边记录卡片，遂利用几年时间整理出一整套《植物名实图考》的卡片。可惜1958年举家南迁时，这套卡片不知去向。好在简焯坡先生将他们考证过的学名抄录在一部《植物名实图考》中，承汤彦承先生转抄，这一稿考证结果才得以保存。

20世纪60年代文革中，吴老被限制自由。他在多年研究《植物名实图考》的基础上，凭借其超强的记忆，偷偷编纂了《新华本草纲要》的植物历史部分的初稿。2002年，吴老在几部较大的学术著作基本成形后，遂萌生全面整理《植物名实图考》中植物的想法。此时《中国植物志》已完成，中国植物本底调查有了初步结果，研究中国古籍文献中的植物可以有所依据了。他用了几年时间，重新整理了《植物名实图考》中的植物。



2002年后吴老考证《植物名实图考》的手稿复印件

吴老与《滇南本草》

明朝兰茂著的《滇南本草》，经长期实践证明是一部价值较高的药学著作，其中记载的植物多为滇中地区植物。这部本草在500多年的流传过程中，经明、清两代中草药医增订、补注，以及有关



志书收编和民间传抄，不仅版本各异，甚至有的地方互相矛盾。要继承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精髓，首先考证清楚其中的药用植物是现在科学分类学上的哪种植物，然后才有可能研究其药理、药性，方能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才能在用药时不发生因原植物鉴定错误而贻误百姓健康的事情。吴老所做的工作，就是着眼于学名考证这一基本工作，但却是现代中医药最为关键的第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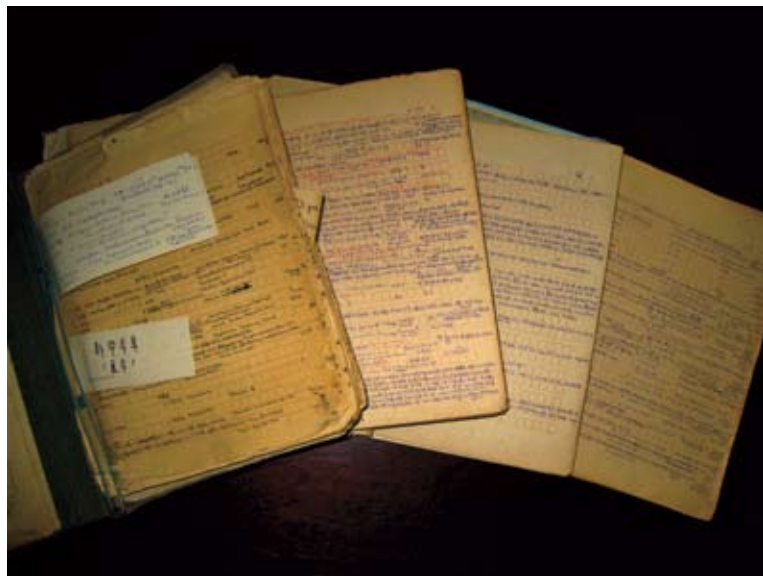
该书1939年便引起吴老和吴韞珍先生的注意，因当时他们在共同考证《植物名实图考》中云南植物，而《滇南本草》中的植物大多被《植物名实图考》收录。而研究《滇南本草》的起因，是当时为解决后方民众日益紧张的医药问题，国民政府成立了“中国医药研究所”，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吴韞珍先生受经利彬的聘请，在这一单位兼差。吴韞珍先生因病于1941年去世，他的一切教学任务和《滇南本草》的整理工作，都转到吴老手中。1945年，《滇南本草图谱》第一集完成。全书共计25种植物，26幅图，全由吴老、匡可任和蔡德惠自写、自画、自印（石印）完成。可惜由于该所停办，只完成此一集，也未能公开发行。但该书遂成为现代植物考据研究的滥觞之作，也自此开启了吴老从事植物考据研究的漫长征程。

研究期间，吴老发现《滇南本草》中的药物“昆明沙参”即“金铁锁”，为植物界的一个新属 *Psammosilene* (1945)。当时国人发表新属实属罕见，何况以现今植物同古籍文献中的资料对照分析，该研究在当时立即引起国内外植物分类学家的关注，赞誉之声不绝。

后来，云南药物所重新整理《滇南本草》，吴老给予了极其重要的支持和帮助。1986年，全书3卷全部整理出版，其中植物能附以学名，吴老功不可没。

吴老与《新华本草纲要》

文革中，吴老因为是“当权派”，又是“反动学术权威”，被剥夺科研权利，分配烧锅炉且自由受限。这期间，国家兴起“中草药运动”，即便科研受限，他还是被请去为云南省中医中药展览会展出的中草药进行学名订正。受中草药运动的影响，他萌生了整理中国本草原植物的想法。吴老说“由于对中国的中草药原植物熟悉，常用的也就那么两三千种”，加上他熟悉古籍文献中记载的植物，遂充分发挥“博闻强记”之优势，整理出中国古代药用植物的四大本笔记。这几本笔记后来成为《新华本草纲要》的基础，其中的植物历史考证，全来自这部手稿。



吴老在“文革”期间完成的《新华本草纲要》手稿

1983~1988年，吴老组织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江苏省植物研究所共三个研究所的力量，编著出版了《新华本草纲要（上、中、下）》这部惠及10亿国民健康的药学巨著。该本草收载植物药近6000种，与前代本草不同，它抛弃了之前以药效或生态进行分类的传统本草著作的体例，按照现代植物分类系统的科属排列顺序，依次介绍每科中每种

植物药的学名、中文名称、俗名、中文名称的来源及其在中国古代记载的历史和药物的化学成分等等。如此科学地整理中国本草，新中国尚为首次。之后约10年，才有《中华本草》问世。

吴老与《中华大典·生物学典》

《中华大典》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中国从三国曹丕的《皇览》开始，大体上300年修一次类书，所以又有“盛世修典”之说。当前离我们最近、规模最大的类书除了明朝的《永乐大典》外，还有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

1932年，钟观光先生因为整理中国植物“邦名”而发感慨：“……整理旧籍，视若平易，行之则难。非经费之难，而人才实难。亦非人才之难，而热心毅力之为难也……惟其人多读古书，不能从事。读书而无科学之素养者，犹隔阂也……需时颇久，成书较缓。此非目光短浅，且暮图功者，所愿为矣……”。2007年初，吴老受《中华大典》主编任继愈先生的邀请，担任了《生物学典》主编。他甚至动员已入耄耋之年的老弟子汤彦承、周铨和陈介等；悬车之年的吴德邻、武素功和李恒等诸多植物分类学家参与了编典。由于大量阅读古籍，吴老眼疾加重，家人反对他参加这项繁重的工作，但吴老说：“我不做，谁来做？”

《中华大典·生物学典》，一是要以现代分类学为基础，将其中涉及的生物冠以拉丁学名，按照现代分类系统排列，希望能通过学名“贯通古今，联接中外”；二是希望用现代图书整理的方法，系统整理中国古代生物学文献，将所涉及的文献，分类整理，按年代编排，编纂出一部生物学类书。这是《生物学典》与其他典的不同，也是整个《中华大典》的创新之处，因为其他典皆遵从中国古代编典的模式。《生物学典》涉及中国古代古籍文献中记载的生物约5000种（其中动物1000多种，植物3000多种），经过全面、科学、系统的分类整理和文献汇编总结后，将对中国文字历史时期的生物多样性物种本底调查清楚。为现代科学研究提供准确而详细的生物学专题资料，对中国传统生物文化的传承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

钟观光曾谓“邦名与学名，如鸟翼车轮，相须并进，不具其一，必兼丧其二……如无学名记录，则义类不明，即与世界文化隔绝，等于薪柴。如无邦名记录，则传达无具，即与国内文化隔绝，等于饰品”。吴老大概也是出于与钟老等先贤同样的尊重和保护中国传统植物文化的心愿，才能潜心于植物考据研究70年，并做出了重要贡献。

今年是吴老辞世的第一个年头，我略记他从事的植物考据研究的历程，表达对吴老的怀念，也以此鞭策自己牢记先生的嘱托，在工作上不能有丝毫懈怠。

